

韋伯系列演講一

劉季倫「韋伯與中國議題」

出入韋伯，入之 深而責之切

物理系 / 蘇雋為



早在第一場演講，圖書館館長、也是當天主講者的王健文教授就曾預告了第二場一冊一世界的講座，將邀請到政大歷史系劉季倫教授主講韋伯與中國議題。談到韋伯，館長認為朋友中這方面最淵博者莫屬劉季倫教授，「出入韋伯，入之深亦責之切」。

王健文教授另外補充說道，第二場演講將會充滿批判的色彩。相信對當時在場的觀眾而言，這並不是特別令人驚訝之處，反而油然而生一股理所當然的想法。畢竟，由一外國人可能由其文化背景來對異國一尤其是與聽者有同血脈、共同情感的民族說三道四。無論好壞與否，深究之前下意識必定對其理論有一絲懷疑、不信任。那麼，在接下來的座談，讓我們來聽聽劉教授怎麼說。

中國與西方比較之爭

韋伯問道：「中國為什麼不是西方那樣？為什麼中國不能有像西方那一套資本主義？」。

在韋伯的著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認為西方資本主義之所以發生在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裡有突破性變遷原動力，而此種原動力正是中國所缺乏的。

我們知道，韋伯曾經對世界各地的文化進行過探討，其一目的在於經過互相參照比較凸顯西方文明之獨特性(此比較無任何高低之分)。而

此處韋伯分析問題的方法是將西方工業資本主義促使經濟發展的因素抽取出，當作普遍性條件，從而在中國找尋軌跡。

然而韋伯用西方例子抽取出的因素去解釋異國的制度，以西方角度分析中國問題不免有單向比較的偏頗疑慮，究竟韋伯從西方社會中所揀選的放眼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性條件，能不能夠做資本主義一詞概念的定義也是個未知數。

如果這些條件不具普遍性，將之套用在非歐洲國家或許會有不同的結果。事實證明中國未必能受益於這些條件，如今第三世界國家亦然，究竟何種條件讓經濟發展起來依舊是未知的。教授點出，此比較造成了中國的「去歷史化」，韋伯在未能仔細爬梳中國史料的情況下，就將中國套用在與西方社會得出的普遍性條件相互比較，中國在比較地位上當然屈居西方，對中國較不公平。

隨後，教授舉出幾個當代學者提出的觀點：

- (1)王國斌之雙向比較法：相對於韋伯的單向比較，分析兩種不同經濟史實，雙方特質皆須納入，以各自的特質互相進行比較，不能單向以一方思考，審查另一方。
- (2)彭慕蘭：中西比較時的適當單位，兩方面積差太大，較適當的比較為長江三角洲與英國對照或中國與歐洲。(劉教授認為不妥)
- (3)錢新祖：韋伯的理論是一種目的論。韋伯所持的史觀是一種目的論，認為歷史發展有其目的，如果近代化成功，則歸功於過去有利

條件的創造；如果近代失敗，則歸咎於前人走錯了路，近代人以自我為中心擁有主觀價值之特權地位及揀選史料以符合近代價值觀，替各種現象發生原因找出過去理由的後出者權力，近於不敗的地位。

中國所謂的「忠」是服從上位者的角色而非本人，服從他人可在不發命令下產生，甚至命令的人可以不存在，此為否定領袖個人的合法性。例如明朝的「土木堡事變」之後，蒙古挾持明英宗攻打北京，當時的大臣于謙在君主與國家之間必須選擇國家，此時命令的人（君主）可不存在。

相反的在西方，利用國王與臣民關係間個人權力的緊張，孕育出一系統化的統治手段，西方合法、理性、依法統治，非人際性的服從法律。

工業資本主義

十九世紀末，歐洲強權紛紛在海外拓展殖民地，大規模的工業化緊接著的就是逐漸高漲的原物料需求。新帝國主義時代，工業國家從殖民地大量掠奪資源進口以供產業利用，基於歐洲各國的保護政策，各國將工業產品輸入到殖民地及其他非工業化國家。後發地區成了原料供給國和工業產品進口國，使得當地原有產業遭受破壞。

如印度大量進口英國棉布，當地傳統棉布產業敵不過外來精緻、廉價的工業產品。

工業化國家大量輸入工業產品至非工業化國，造成後發地區國家更不可能工業化。同時非工業化國成了原料的供給國與工業產品的進口國，經濟上也就更加依賴歐美資本主義。

提到這裡，劉教授舉了福特汽車作為例子，亨利·福特在當時大幅提高員工的薪水，一方面出於當時社會氣氛的考量，另一方面保證自家員工購買福特汽車。教授指出，此現象反映了美國的工業發展市場被歐洲搶走的狀況。

殖民時期大大高漲的種族優越感，給了歐洲人壓倒性的自信，由此可見自然不可忽視種族主義、殖民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刺激，也不免懷疑究竟其影響力在促進經濟發展這方面是否真的超過韋伯主張的新教倫理精神，關於此問題中的交互影響關係還待進一步考證。

再來談談殖民，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互動之間有數不盡人性貪婪醜惡的一面的，簡報上一張張怵目驚心的剛果人斷掌照片，揭發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如何敲詐剝削殖民地百姓，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就曾對此撰書諷刺這位暴君。

同樣的，歐美資本主義大量入侵拉丁美洲奪取金礦資源，戕害當地傳統工業。種種現實表明，拉丁美洲所做的犧牲換來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勝利，還得應付他們所留下來的爛攤子，可謂歷史的遺毒。關於這方面的經典著作，教授演講中推薦了《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這本書給各位觀眾，作為此議題的延伸。

究竟，體認到以上種種西方「文明」事蹟之後，我們所認知的「文明」又是什麼？

對此疑問，教授摘錄了一段日本思想家岡倉天心所談到他所認為的「文明」。岡倉天心認為，日本茶儀並未改變西方人視日本為蠻夷之邦的看法，「直到日本人在滿州戰場上殺害無數生靈，才改口稱日本是文明國家」，西方對日本的興趣，僅只聚焦在「武士道」這門「死的藝術」，卻很少注意到代表「生的藝術」的茶道。若所謂「文明」真是如此，那我們寧願繼續野蠻下去。

高度平衡陷阱

回到中國資本主義發生與否的問題，教授引用了「高度平衡陷阱」一詞解釋此問題。此理論由英國歷史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所提出，闡述了在高度平衡陷阱之下，中國人口增多使得農業剩餘減少、資本短缺昂貴、工資低廉，隨著農

耕與運輸技術發展至極限，多數土地已開發殆盡。一旦資源短缺，靈活運用廉價運輸優於發明節約人力器械所耗的成本，造成發明意願低落。也因此，中國成了巨大的靜態市場。

人力成本低廉，商人削價競爭使得價錢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因而產生官商勾結。教授舉了清朝乾隆年間紀曉嵐的一次買到假鴨的遭遇，此事見於《閱微草堂筆記》：又燈下有唱賣爐鴨者，從兄萬周買之。乃盡食其肉，而完其全骨，內傅以泥，外糊以紙，染為炙爆之色，塗以油，惟兩掌頭頸為真。

教授解釋，竟然有商人為了騙這小錢大費周章地做出如此精緻的假鴨，足見當時工資之低廉。

延續這主題，似乎中國不會自然發生資本主義成了定論，那如果當時中國從西方引進資本主義，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

會後問答時間，台下一名聽眾向教授提出關於中國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可能性的疑問。似乎教授此行有備而來，不僅再次詳述高度平衡陷阱的特徵，陳述生態環境發展至極限（農業剩餘減少）時，甚至舉出海水稻作為例子。另外教授繼續談到，清末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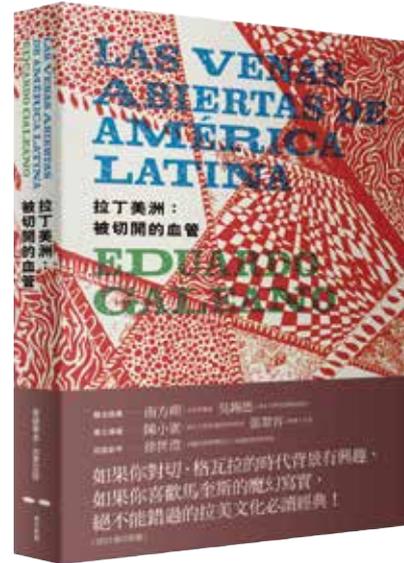
連串不平等條約迫使中國向西方打開大門進行貿易，同時關稅喪失自主權，無法保護國內工業。西方工業勢力大舉入侵中國之下，中國手工業敵不過西方器械大量生產。尤其東南沿海一帶，有西方資本主義的消費但沒有那樣的生產，導致中國農村經濟瓦解，中國沿海農村生產無市場，從而城市與村落脫離，這也是太平天國之亂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演講心得

在星期五一個晴朗的午後，圖書館安靜的一隅，跟著劉教授的導讀，言談中韋伯反而居次要地位，漸漸退入幕後，褪去權威壟斷的強勢地位，讓位給各家之言爭拾真理的片段。聽者跟隨講者穿梭各家之間，旁徵博引兼採諸家，佐以客觀史實。有這麼一個感覺，聽者眼中不再只是一人之影，而是同時那麼多人向一人同時提出疑問，好像視野一下拓展開來，連自己也想提出問題、解決問題，而不是只是盲從一人的理論。

講到西方工業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那一段，劉教授提到的種種現象、一段段沉重、殘酷的歷史，似乎一直在向觀眾反省所謂「西方價值」，究竟這近乎信仰的咒語在世界背後帶給多少人不幸？西方價值之兩面是否僅是人為關係之破壞，非關理念本身；或是西方價值就是如此、一必然的結果。教授提出一連串的反思，引導聽眾思考這個問題。

此次演講，不只是討論韋伯究竟怎麼看待中國為何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也藉著後世諸多學者的評判與歷史的事實，多方角度相互參照比較，企圖脫離講題劃給韋伯思想獨佔的地位，不至於在不知不覺中，使得聽者於整個演講中，下意識在韋伯之陰影下思考。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書影